

#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 研讨会论文集

詹伯慧 /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 论文集

主 编 詹伯慧  
编 选 邵 宜  
姜 波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石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詹伯慧主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7

ISBN 7-81029-430-X

I. 第…

II. 詹…

III. 方言学

IV. H07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

暨南大学照排中心排版

新华书店经销 暨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97×1094 1/16 印张:15.25 字数:35万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

定价:28.00元

# 目 录

前言 .....	唐伯慧 1
欢迎词 .....	周耀明 3
不断开拓 继续前进——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开幕词 .....	唐伯慧 4
闭幕词 .....	唐伯慧 7
广州语音系的分析和处理 .....	张振兴 张惠英 8
重新考虑广州和香港粤语阴上调值和高升变调调值 .....	包睿舜(Robert S. Bauer) 12
广州话常用词里的几种字音变读 .....	李如龙 19
中古全浊上声与现今广州话声调 .....	罗伟豪 23
广州话的长短音在其它方言中的对应 ——兼评粤语长短音非汉语底层说 .....	钟奇 28
粤语小称变音与“儿”尾综述 .....	邵慧君 32
粤语韵母 oe、oen、oek 的演化 .....	吴叠彬 41
香港粤语 $\sigma$ - $\eta$ - 变异研究 .....	林建平 48
粤方言音系的特点与考本字的联系 .....	陈伯辉 57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语音与广州语音比较 .....	唐伯慧 邵宜 伍巍 65
临桂两江平话声韵调与广州话的比较 .....	梁金荣 78
罗定、云浮、德庆的粤语语音特点 .....	余伟文 84
广宁话的 h 声母 .....	张晓山 88
粤语壮语关系词的分类问题及类别例释 .....	刘叔新 93
粤语和壮语关系的量的描述 .....	陈佩瑜 107
马来西亚粤语中的借词问题初探 .....	千岛英一、樋口靖 113
现代汉语共同语语篇使用粤方言变体的制约因素 .....	陶原珂 121
粤方言文化的作用力 .....	陈思泉 125
粤港澳地区粤方言词语进入共同语书面语的现象 .....	何科根 129
略论粤方言对中山闽语词汇系统的影响 .....	陈小枫 135
粤语名词组中的后置修饰语 .....	陆镜光 141
粤语的另类形容词 .....	汤志祥 147

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 .....	施其生	155
广州话量词的定指功能 .....	周小兵	164
广州方言的语气词 .....	植符兰	168
广州话副词“都”浅议 .....	蔡建华	176
广州话里的反复问句形式 .....	方小燕	180

谈谈利用电脑进行粤语语音教学 .....	林柏松	185
词语对译及其教学 .....	曾子凡	188
从交际性教学原则谈几本海外常见的对外粤语教材 .....	梁启昌	194
陈子襄和粤方言教学 .....	胡培周	198
略谈文化背景对粤—普口语对译的影响 .....	梁莉莉	201
成人口语教材编写体系探索 .....	熊怀苑	205
修订广州话拼音方案的新设想 .....	饶秉才	210
电脑辅助粤语速记方案 .....	蔺荪 冼景炬 邹嘉彦 郑定欧	217

## 附录

### 注重基础与现代化转向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述评 .....	陶原珂	228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报刊报导摘录 .....		231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与会者名录 .....		233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工作人员 .....		237

# 前 言

詹伯慧

两年一届的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自从 1987 年首届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开了下来,从没有间断过。到了 1995 年 12 月,我们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和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再度接过了接力棒,在广州举办了第五届研讨会。这十年五届的学术研讨会,展示出多少海内外粤语学者的研究成果,凝聚着多少海内外同道的深厚情谊!

近十多年来,汉语方言研究事业蒸蒸日上,其中突出的标志之一就是各大方言纷纷定期举行本方言的学术研讨会,检阅本方言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为研究本方言的学者提供相互切磋、交流心得、开展协作的良好机会。倘若各大方言都能持之以恒地把这类学术研讨会办下去,对于汉语方言研究工作的持续发展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无疑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粤方言作为在海外影响很大,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应用基础的汉语方言,在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举行学术研讨会议方面,一直是不遗余力的。最近举行的这次第五届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非常踊跃,大家在会上发表的许多高论,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有不少令人瞩目的新意。本届研讨会收到的论文共 60 多篇,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粤方言研究正在向着兼具研究型和应用型两个方向发展。这正体现出语言科学研究为语言应用服务,语言理论探讨密切联系语言实际的良好学风,值得进一步发扬。

筹备经年的研讨会只开了几天便降下帷幕。但是,研讨会的闭幕并不意味着这届研讨会的任务已全部完成。在会议闭幕后的一些收尾工作中,最重要而且最艰巨的一项,便是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出版了。这需要精心的策划和组织,需要付出许多的心血,承受许多的麻烦。只有到了可以把论文集印出来奉送到与会学者手上,会务工作才算圆满地划上了句号。

本届研讨会收到的 60 多篇论文中,经过遴选最后确定把其中 35 篇文章汇集起来,作为《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出版发行。限于出版条件,在遴选的过程中,我们为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未能选入论文集而深感遗憾。事实上,提交到本届研讨会上来的论文,绝大多数都属优秀之作,只因篇幅所限,我们不得不割爱一部分,这只好请论文未能收入的学者多多包涵了。

此刻摆到大家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共收论文 35 篇,内容大致涵盖综论、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言比较、语言应用、语言教学等各个方面,堪称丰富多采。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两年一度的粤方言研讨会业已登上了它的第五个阶梯,正在向着第六个、第七个阶梯攀登。论文集的问世无疑将大大鼓舞我们继往开来,使粤方言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更加

丰硕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要深深感谢出席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并为之提供研究成果的各位专家学者,我们也要深深感谢为使这本论文集得以及时刊行而付出许多艰苦劳动的朋友们。我们将此书献给第六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我们衷心期望着在澳门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将取得更大的成功。预祝粤方言的研究事业不断开拓、不断前进,创造出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业绩来。

1997年7月

## 欢 迎 词

暨南大学校长 周耀明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今天在我校正式开幕了，这是我校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请允许我代表暨南大学全体师生，向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向光临此次盛会的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传播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语言文字工作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粤方言是汉语方言中重要的一支，是两广地区、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区中通行很广的交际工具。粤方言的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课题，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瞩目。我校是一所面向海外、面向港澳的华侨大学，长期以来对于粤方言的研究都给以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支持。近十年来，我校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在詹伯慧教授的领导下，组织开展粤方言的大面积调查，取得了不少成果，特别是对珠江三角洲方言的调查，先后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张日升教授等通力协作，完成了150万字的《调查报告》，获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语言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91年我校建立了以汉语方言为专业方向的现代汉语博士点，迄今已培养了几批博士生，为海内外输送了年青的语言学生力军。我校的方言研究工作，现正在继续拓宽领域，进一步加强对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等的调查研究，希望能做出更大的成绩，为中国语言学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各位来宾、各位学者，暨南大学有近90年的历史，但我们的办学条件还不够完善。我们正在锐意改革，希望能够尽快改善办学条件，培养出更多的合格人才，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恳切希望到会各位海内外学者多多支持我们，多多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把这所华侨大学办好。

祝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1995年12月21日



## 不断开拓 继续前进

###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开幕词

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 詹伯慧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经过将近两年的酝酿筹备，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现在开幕了。在这里，我谨代表筹备委员会，代表主办这次研讨会的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和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向来自海内外的语言学界朋友，向为大会提供研究成果的粤语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光临大会指导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热心关怀、鼎力支持这次大会的省高教厅、省社联、省语委及新闻传播媒介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两年一度轮流在香港、广州、澳门举行的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是检阅粤方言研究成果、团结粤方言研究学者、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加强协作的学术盛会。从198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首届会议以后，由香港到广州，由广州到澳门，又由澳门回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回广州。我们穗、港、澳三地的粤语学者，本着推动学术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一届又一届地把粤方言研讨会的接力棒传递下去，使粤方言的研究继往开来、经久不衰，在语言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赢得海内外学术界的赞誉。研讨会给散居在海内外的粤语同道提供了发表见解、互通信息、交流心得、总结经验的机会，这对于粤方言研究的深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使我们共同的学术事业得以保持长久的繁荣，使我们的学术队伍能够永远充满活力。在粤方言的研究中，我们必然会接触到一系列语言科学的问题，也必然会接触到许多地域文化上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有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探索，这又必然会带动古今汉语各个领域的发展。现代方言和现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今后我们的粤方言研究还将不断注入现代化的新内容，我们的研究天地将越来越宽阔，我们的研究成果将越来越丰硕！

随着粤方言地区的飞跃发展，粤方言的社会功能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如一位报道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1989)的记者所提出的：“粤方言研究已成为世界性课题。”近几年来在不少地方悄悄兴起了“粤语热”，使得教粤语、学粤语已不单纯是粤方言区的事儿了。从语言研究服务于语言应用的原则出发，当前我们粤语学者理应拿出更多能够为粤语的教学提供方便的应用型成果来。我们的研究目标，自然也应该更多地联系粤语地区社会的实际需要来考虑。值得高兴的是：近几届的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有越来越多的论文是属于应用语言学范围的。拿这次第五届研讨会收到的60多篇论文来看，就明确显示

出粵方言的研究正在向应用型倾斜。着眼于语言生活的现实,着眼于语言交际、语言传播的实际需要,粵方言的研究必然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次提交的论文,除了词汇的研究和语法的研究比重较大以外,直接服务于粵方言应用的论文如粵语拼音方案的设计、粵语电脑教学问题的探讨以至论及粵语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粵语词典的编纂等等,都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家抱着同一个宗旨:更好地为粵方言地区的社会发展服务,更有效地为粵方言区的广大民众服务。我们认为:大力加强粵方言的应用研究,跟眼下举国上下推广普通话是完全不矛盾的。普通话是民族共同语,全民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也是国际上代表中国的语言,粵方言区人民大众理所当然地都应积极学会它,掌握它,并且使它成为社会共同交际的通用语。但是,推行民族共同语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方言,说到底,“推普”的目的是提供方言区的人学会说普通话,从而使人们从只能用方言的单语生活过渡到既会说方言、又会说普通话的双语生活,并使普通话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语言,而使方言作为地域性的交际工具,长期保存在较为狭窄的交际圈内,例如在家庭之间、在乡亲之间使用。正是这种共同语与方言并存并用,有主有从,提倡一种,保留一种的态度,促使我们一方面既要大力推行普通话,一方面仍要认真做好粵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着力把粵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研究放到突出的地位上来。只有我们熟谙粵语又掌握普通话,才能运用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从“知己知彼”的原则出发,来做好粵方言区的“推普”工作,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大家通报一下有关粵方言研究进展的情况:自从1993年12月在香港举行第四届国际粵方言研讨会以来,两年间粵方言研究又有了很大的进展,此次会议上提供的60多篇论文就是具体的体现。在我们这个会议举行的前夕,由郑定欧博士发起、华南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今日粵语研讨会也在广州举行,那是一个规模较小、集中讨论粵语语法方面问题的会议,会上宣读的论文也有30篇之多,这说明粵方言研究者正以大会套小会等多种切磋的方式活跃在南粤的大地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这里我想特别一提的是:两年来无论是大面积的田野调查还是单点的深入研究,都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拳头产品”。我们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在持续十载和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原“中文及翻译系”)张日升、张群显等同道学者通力合作取得众所周知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成果之后,近几年来又继续合作完成了对粵北和粵西地区共30个县(市)粵语的调查,去年出版了128万字的《粵北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另一本姊妹篇《粵西十县(市)粵方言调查报告》也已定稿付梓,可望明年面世;在座的李新魁教授、黄家教教授和他们的几位高足合著的《广州方言研究》也已在今年夏天出版,这无疑是在继80年代高华年教授《广州方言研究》之后又一部广州话研究的扛鼎之作;李新魁教授的另一大著《广东的方言》也在去年作为《岭南文库》的一种和读者见面了。与此同时,我们还高兴地看到:两年来有一批应用型和教学型的粵语著作相继问世。如郑定欧博士主编的《今日粵语》上下两册业已出齐,陈慧英教授的《实用广州话词典》也在去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刊行,而深蒙大家关注的由我们粵、港、澳粵语同道合作编纂的《广州话正音字典》正在紧锣密鼓的撰写之中,争取明年能和大家见面。有了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作基础,又有一批不断运用研究新成果撰写的应用型教学型著作陆续面世,这就使我们粵方言研究的结构更臻完善。沿着这一“全面开花”的路子走下去,粵方言的研究必

然会越来越繁花似锦,璀灿夺目!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比起六年前(1989)我们在广州首次承办的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来,前来出席这次第五届研讨会的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学者空前踊跃,人数约占全体出席人员的一半,这说明广州作为粤方言的代表点正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面对这嘉宾云集的场面,我们深感荣幸,也深感责任的重大。也许我可以在这里代表我们广州地区的粤语工作者表一个态:我们一定不辜负海内外同道的期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尽心尽力做好粤方言的田野调查工作,更多地积累实际调查的粤语语料,更认真地开展全方位的探讨研究,并努力为大家创造切磋交流的机会,使粤方言的研究能不断登上新的台阶,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

接过第四届研讨会的接力棒,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今天在这里揭开帷幕,这就意味着第六届、第七届的研讨会还将接连不断地举办下去,意味着我们还会有一次又一次的丰收,粤方言研究事业将万古长青,永不褪色!

祝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到会的朋友们在广州期间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1995年12月21日

## 闭 幕 词

詹伯慧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经过大会小会的交流切磋，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收到的60多篇论文，除了个别学者因事未能到会外，已全部宣读完毕并展开过讨论了。这次研讨会虽然时间很短，但无论大会小会，大家都全神贯注，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参与，在餐桌上，在参观中，朋友们仍然争分夺秒，继续交流，情景感人。这次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涉及粤方言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是作者潜心研究的最新成果，参与会议的朋友们都深感收获丰富，得益良多。我想这次会议反映出来的特点，也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 粤方言的研究工作正在朝着不断拓展、不断深入的方向发展。而有关粤方言的社会应用问题，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课题，如何更好地发挥粤方言在粤语地区的作用，使之和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在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人民大众中形成有主有从、双语并存的语言交际格局，则是社会各界都很重视的事情。

2. 粤方言的研究队伍正在不断壮大。长江后浪推前浪，当今活跃在粤语研究第一线的，不少是年轻力壮的朋友，他们朝气蓬勃，目光敏锐，思路开阔，能及时发现、及时抓住粤方言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调查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论点来。这是我们粤方言研究得以保持继往开来，经久不衰的最重要保证。

3. 这次会议充分贯彻了“双百”方针，与会学者不囿于粤语研究中早已形成的某些论点，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来。如张振兴教授提出关于粤语音系归纳问题的讨论，包睿舜教授(Prof. Robert Bauer)提出根据实验所得的关于粤方言某些调值的讨论等等，都很有新意。有讨论才有进步，在学术领域内，只有经常切磋研讨，才能取长补短，才能把粤方言的研究推上新的台阶。

朋友们，我们的研讨会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已经胜利完成各项议程，就要降下帷幕了。会议有期，学术的事业却是无限的。我们大家勤奋耕耘，已在粤方言研究中作出很大的成绩，此刻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有了一连五届研讨会的基础，今后的第六届、第七届必然会有更大的进展，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粤语的研究前途无量，灿烂辉煌！

现在，请允许我宣布：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胜利闭幕！让我们再接再厉，在第六届研讨会上拿出更多的成果来，到澳门再见！

祝与会朋友们归途顺利，身体健康，合府康乐，节日愉快！谢谢大家。

1995年12月23日

## 广州话音系的分析和处理

张振兴 张惠英

许多论著都讨论过广州话的语音系统,并做过分析和处理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四种作品:

(1)《广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较》(附常用词、词组、短句对照)。陈慧英、白宛如,《方言和普通话丛刊》第一辑第5—102页,中华书局,1958年。

(2)Studies in Yue Dialect 1: Phonology of Cantonese. Oi - Kan Yue Hashimoto(余霭芹), Princeton - 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pp. 1 - 755.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2.

(3)《广州方言研究》。高华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0年。

(4)《广州方言研究》。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从以上四种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广州话语音系统的记录和处理是有差别的。例如,陈慧英(1958)长元音[a:],余霭芹(1972)记为[A:];陈慧英(1958)舌尖音声母[ts ts's],李新魁(1995)记为舌叶音[tʃ tʃ' ʃ];陈慧英(1958)的三个短元音韵母[e o ø],高华年(1980)分别记为[ɛ ɔ œ],因此,这三个短元音韵母为主要元音的元音尾、辅音尾韵母在表面上也都不一样;陈慧英(1958)、余霭芹(1972)、高华年(1980)不带介音的韵母都是53个,但李新魁(1995)记录的不带介音韵母是59个,多了[eu em en ep et œt]等六韵,其中[œt]韵只见于[œt<sup>2</sup>](隔),另外五个韵只见于新派广州话。还有一些其他差别,不一一列举了。不过,这些差别都不是主要的,因为它们并不构成各家对广州话语音系统性上的分歧。相反,各家在广州话语音系统性上有很重要的一致性。例如都认为广州话的元音有长短之分。试分析之:

(A)	a:	ɛ:	œ:	ɔ:	i:	u:	y:
(B)	ɐ	e	ø	o	i	u	y

(A)系列是长元音,(B)系列是短元音。长元音可以单独做韵母,也可以带元音韵尾或辅音韵尾;短元音[ɐ e ø o]必须带韵尾,[i u y]只能做韵尾。就元音和韵尾的关系而言,它们也存在互补关系:当元音是长元音时,韵尾相对就短;当元音是短元音是,韵尾相对就长;当韵尾是一个塞音尾时,元音总是相对短;当韵尾是零的时候,元音总是长的。我们观察广州话的长元音和短元音,可以发现既包含着音长的差别,也包含着音质的差别。因此,在实际记音时,单纯用音长的不同来区别长短音如[a:m amla:n|ɛ:ŋ ep]等,这显然是不够的,最好用不同的元音,同时表示音长和音质两方面的差别,这样还可以省去非常麻

烦的长音符号,如上文(A)(B)两个系列去掉长音符号后,可以改写为:

(A) a        ε        œ        ɔ        i        u        y  
(B) e        e        ø        o        i        u        y

就是说,长元音发音部位略前略开,音长较长;短元音发音部位略后略关,音长较短。[i u y]三个不必区别,因为如上文所说,在广州话里,做韵尾的[i u y]总是短元音,单独做韵母或做主要元音的[i u y]总是长元音。现在通行的广州话长篇记音材料,一般都用以上办法记音。可见一致性非常高,如实地反映了广州话音系的实际情况。

也有不一致的。最重要的分歧有两个:一个是广州话有无介音,以及与此相关的广州话音系处理办法。另一个是广州话音字调是九个还是 11 个,如何处理高平变音和高降变音。声调问题比较简单,拟另文讨论。本文只讨论广州话有无介音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李新魁(1995)有详细的讨论。我们还是回到上面所列四家有代表性的作品。余霭芹(1972),高华年(1980),李新魁(1995)三家所列广州韵母表都没有带[-i-、-u-]介音的韵母,声母表里都有[kw kw w j]四个声母(不妨看作 ku k'u u i),显然,都主张广州话“无介音说”。陈慧英、白宛如(1958)广州话韵母表里单独列有带[-i-]介音的韵母 18 个[ia iε iəu iøy iəm iem iən iöm iεŋ iεŋ iœŋ iøyŋ iəp iet iak iek icek iok],带[-u-]介音的韵母 15 个[ua uə uai uei uan uen uaŋ uəŋ uœŋ ueŋ uat uet uak uək uek]。表面上看,这是主张广州话“有介音说”的,但是作者很明白地说过,“单就广州话而论,i u 可以看作是声母”,因此从本质上说,还是广州话“无介音说”。

讨论广州话有无介音,关键是上列 33 个韵母里[-i- -u-]的性质。高华年(1980)表述得最明白无误:“声母 kw k'w 中的 w 不带摩擦成分,只表示 kw k'w 的圆唇化”;“单用时的 j w 都是浊擦音,摩擦成分很轻。”拿这个跟其他方言(包括北京话)拼[k- k'-]声母的合口呼韵母 u 介音比较,拼零声母[ø]的合口呼、齐齿呼韵母 i u 介音比较,广州话的[j w]和其他方言的[i u]并无实质性的差别,至少一般人的耳朵里头听不出什么明显的差别。拿北京话来说,除了单用的以外,作介音时拼[k- k'- ø-]声母的[i u]都有轻微的摩擦成分,其中的[u]至少都引起声母的圆唇化,[u]介音拼零声母时,现在北京一部分年青人往往唇齿化为[v]或[v̥]。既然广州话的[-i- -u-]跟其他方言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就应该认为有介音。当然,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事实,跟其他方言比较而言,广州话的介音是不发达的。因为广州话的[-i-]介音韵母能拼[ø]声母,[-u-]介音韵母能拼[k k' ø]声母,而北京的[-i-]介音韵母能拼[p p' m, t t' n l, tɕ tɕ' ɕ, ø]等 11 个声母,[-u-]介音韵母能拼[t t' n l, ts ts' s, tʂ tʂ' ʂ z, k k' x, ø]等 15 个声母。

不过介音不发达不能够支持广州话无介音说之成立,因为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性是不能从语音结构上数量的多寡来决定的。正如李新魁(1995)只发现“囑”字读[œt<sup>2</sup>],就必须把[œt<sup>2</sup>]韵看成广州话的一个新韵母一样。当然,处理语音系统时,单就广州话而论,把[-i- -u-]看作声母并非一定不可,因为广州话有无介音和如何处理广州话的介音是两回事。如果在声母系统上增加[kw kw w j]四个声母,就可以在韵母系统上减少 33 个带介音的韵母。稍微增加声母系统的数量,却大大减少韵母系统的负担,这种语音系统的经济原则的确是非常诱人的。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经济原则至少带来四种不便:(1)不便于广州话和其他方言的比较研究;(2)不便于其他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的处理;

(3)不便于广州话地区的普通话教学工作;(4)不便于制定广州话的拼音方案。第一个不便显而易见,不言自明。下面略微扩展一下,说说另外三条不便之处。

不便于对其他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的处理。这指的是广州话语音系统处理方法的一种误导作用。有的汉语方言声韵母的结构关系跟广州话完全不同,但受到误导也采用广州话的音系处理办法,结果自然是错的。举江西黎川方言为例。颜森《黎川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记录黎川话 23 个声母,提出[k k' Ø]拼 u 介音时,u 介音看作是声母的一部分,因此单立[ku k'u u]三个特殊声母,这样,可以节省若干个带[-u-]介音的韵母。但是却声明,[ku ku]拼[a o ε i ai oi an on en ən/əi? aŋ/a? ɔŋ/o? eŋ/ε?]等韵母时,要把这些韵母当合口呼看待。这样,在讨论该方言语音结构时,a o ε 等韵母既是开口呼,又是合口呼;[ku k'u u]拼 i 韵母时,i 成了主要元音,其实应该是 ui 韵,i 是韵尾,跟该方言里 ai oi ei 等韵母的 i 是一样成系统的;再说在这个方言里,带 i 介音的韵母跟带 u 介音的韵母几乎是平行的,既然可以单立[ku k'u u]三个特殊声母,为什么不单立[ki k'i i]三个特殊声母呢?甚至可以单立[ky k'y y]韵母。如果类推下去,就无法建立这种方言的语音结构了。这是一种由误导产生的危险。

不便于广州话地区的普通话教学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拿广州话同音字表看一下就明白了。大家都知道,同音字表在方言区的普通话教学中有重要价值。试拿广州话[a]韵举例,举例时声调暂时撇开不论,略举少量例字。

pa	巴爸疤把坝吧罢	sa	沙痧洒
p'a	趴爬扒耙怕	ja	呀
ma	妈马麻嘛骂吗码	ka	家加嘉假价架嫁
fa	花化	k'a	卡伽
ta	打	ŋa	牙芽衙雅
t'a	他它她	ha	蛤霞虾下厦
na	拿那哪娜	kwa	挂呱寡挂封
la	啦喇	k'wa	夸跨垮胯垮
tσα	渣咋炸榨乍	wa	蛙蛙华画化话
ts'a	差叉岔沲茶	a	啊鸭丫亚

按以上[a]韵字,教学普通话时必须说,广州话的[a],逢广州话是[p - t - ts - ]三组声母时,普通话也是[a] (“花化”两字是[ua]),逢广州话是[k - ]组和[j]、[Ø]声母时是[ia],逢广州话是[kw - ]组声母时是[ua]。如果让 w j[u i]属介音,教学普通话时至少可以省去最后一句话。显而易见,对于学习普通话的人来说,要弄清楚[kw kw w j]是很厌烦的。

不便于制定广州话的拼音方案。我们可以举 1960 年广东省教育厅行政部门正式公布的《广州话拼音方案》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方案设立了 22 个声母,53 个韵母(包括自成音节的 m[m]和 ng[ŋ]),九个声调(用六个符号表示,阴平、阴去、阳去分别跟阴入、中入、阳入合并)。问题就出在[kw k'w w j]四个声母上。方案分别 z c s[ts ts' s]和 j q x [tɕ tɕ' ɕ]两组声母,并规定 z c s 一组拼开口呼韵母和包括 u 等开头的韵母,j q x 一组拼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母。可以看它的 53 个韵母表,z c s 拼 u 开头的韵母限于 u ui un ung

[uŋ] ud[ut] ug[uk]六韵, j q x 拼齐齿呼的韵母限于 i iu im in ing[iŋ] ib[ip] id[it] ig[ik]等八韵。这么一来, 相当于 kw k'w w j 不写作 ku k'u u i, 是怕跟 k+u k'+u u i 相混, 故意用上半元音 w j, 陈慧英、白宛如(1985)所说的带 u 介音的 15 个韵母, 带 i 介音的 18 个韵母便被排除在合口呼和齐齿呼韵母之外, 只能分别跟方案中的 gu[kw] ku[k'w] w[w] 和 y[j] 相拼。这个方案说明是说, gu ku 是圆唇的舌根音, 只作声母用, 不能单独注音, 单独注音是音节, 不是声母。又说, y w 作声母使用, 拼写出来的音节相当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复韵母, 但由于广州话中这些音前面不再拼声母, 因此只作为音节使用。这些说明是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

综合上文所说, 我们主张在处理广州话语音时, 在声母系统上减少[kw k'w w j]四个声母, 在韵母系统上增加 33 个带 u, i 介音的韵母。这样广州话的声母系统是 18 个声母, 韵母系统按照李新魁(1995), 当从 59 个增加到 92 个。那么, 广州话声母不是太少, 韵母不是太多了吗? 其实这样正好跟厦门、福州、潮汕等地的闽语方言取得一致。这几个地方的韵母数目也是很多的。



# 重新考虑广州和香港粤语阴上调值 和高升变调调值

包睿舜(Robert S. Bauer)

## 1. 阴上调值:35 还是 25?

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人在描写广州和香港粤语的调值时采用赵元任的调值符号 35 来代表阴上调值,譬如赵元任(1947:24);霍陈婉婉(= Fok 1974:12);袁家骅(1983:185);饶,欧阳,周(1981:275);詹,张(1987:8)。但徐云扬(= Zee 1991:47—48)和石锋(1993:3)按照声谱仪的测量结果都说阴上调值是 24。最近 Kei, Smyth, So, Lau, Capell(1996:18)也进行很仔细的声学性的研究来测量香港粤语声调系统的基本频率。本研究计划一共有 56 位发音人。研究者发现阴上调和阳上调都有同样的中低开始点,也作结论说用调值符号 25 来代表阴上调值和用调值符号 23 来代表阳上调值最妥当。

## 2. 利用电脑化声谱仪 WINCECIL 测量声调基本频率

本研究者也对广州和香港粤语的调值问题很有兴趣。为了测量广州和香港粤语各种调类的基本频率,本人采用电脑化声谱仪 WINCECIL(软件名)来进行这种研究工作。本人用这种电脑软件来录六位发音人:有两位广州发音人(一位是男人,一位是女人),四位香港发音人(两位是男人,两位是女人)。他们年纪是从 28 到 65 岁左右,按照他们的教育水准(五位是大学毕业的),他们的话代表标准广州和香港粤语。电脑化声谱仪 WINCECIL 能够在电脑屏幕上显示一种图像来代表所录音的基本频率,然后就用软件的功能来测量本图像的高低[单位是赫兹 = Hz(Hertz)]和长短[单位是毫秒 = ms.(milliseconds)]。用电脑的列印机来印出本图像也很方便。本论文图形 1 至 8 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 3.1 本研究结果之一:阴上调有 25 调值

图形 1 至 4 陈列两位广州发音人和两位香港发音人的阴上调(“椅”字),阳上调(“耳”字),阴去调(“意”字),和阳去调(“二”字)的基本频率对比。为了作方便的比较,表一列举基本频率最低点和最高点(上升调)与最高点和最低点(平降调)。按照基本频率的测量,广州和香港粤语的阴上调基本频率的最低点和阳上调基本频率的最低点都很相像,至于调值系统,应该说一样。因为两种调值的最低点比阴去调值的最低点还相当低,所以用调值符号 25 来代表阴上调值和用调值符号 23 代表阳上调值最准确。本研究结果和 Kei, Smyth, So, Lau, Capell(1996)的结果相同。